

历史人物 思想篇

李大钊民彝思想与 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

民彝思想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本文试就民彝思想的内容、意义和演变做一分析 兼论它与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

—

在李大钊早期著作中，“民彝”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出现的。李大钊这样解释“民彝”，他说：“诗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爱取斯义，锡名民彝，以颜本志。”^①他又说：“明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然则民彝者，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澄，实之则为逻辑之用也。”^②这些都是在讲“民彝”的性质。那么，“民彝”具有哪些作用呢？在李大钊看来，“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民彝者，民宪之基础”；“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③。“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缚民彝”^④。

关于李大钊对“民彝”的解释，学术界有不同的理解。《李大钊

传》的作者认为“古代的彝器 象征着帝王贵族的统治 李大钊同志则以‘民主’、‘自由’的精神阐明民彝的含义。^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则指出“所谓民彝 就是‘人民的法则’”,李大钊把民彝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民彝是‘唯民’精神与政体代议制形式的结合^⑥。李龙牧的看法是“简要地用现代语言来表达 这‘民彝’约略近于说人民的意志、愿望等。所谓‘通民彝于国法之制’,也就是指的更合乎民意的政治制度的意思’^⑦。朱成甲在《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这部力作中设专章详细分析了李大钊的‘民彝思想’。他认为“所谓‘民彝’ 所谓‘民之秉彝’ 它的实质也就是‘民之秉彝’、‘民常’、‘民性’ 是具有一般的哲学抽象的。因此 实质上也就是‘人性’”^⑧。

上述看法 在笔者看来 都是有道理的 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可谓见仁见智。笔者出于兴趣 也试图参与对民彝概念的讨论,就民彝的涵义做一探讨,求教于同仁。

我认为“民彝”是一个带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概念 李大钊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很多新的政治含义。但最根本的有两点 民彝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民彝是人民的权利的象征 这种意志和权利的统一是民所固有的‘秉彝’。意志体现形上之道,权利则代表着形下之器。而以彝释民则更表示民的神圣。因为彝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表示法度、权威。在李大钊看来 只有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捍卫共和的思想武器。

二

朱成甲先生认为“‘民彝’在李大钊的著作中 并不是一个普

通的词汇 而是表明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新的思想 是以‘民彝’为基础、为核心的。通过‘民彝’ 李大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历史观、哲学观和伦理观 阐述了自己的‘为治之道’和‘衡事理之器’ 探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教训与今后的道路问题。李大钊的这种思想 不同于他在反袁之前的民主思想 也不同于辛亥革命前后曾经流行的孙中山等人的民主思想。这种思想用‘民主’二字来概括 未免过于宽泛 它不能表示这种思想的确切涵义的特质。如用其他概念 也很难作出准确的概括。比较恰当的说法 我认为应该称之为‘民彝思想’。^⑨

笔者完全赞同朱成甲先生的这个见解,“民彝”的确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 它集中体现着李大钊的政治思想。那么 就我的理解,“民彝思想”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 必须“以自由为基”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实现“意念自由”。

强调“自主意识”和“意念自由”是李大钊民彝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 李大钊所谈论得最多的就是自由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可以看作是一篇自由宣言。《民彝与政治》是李大钊在结束留学生活之际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 这篇文章是他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民主政治进行深刻反思的理论成果,也是他批判袁世凯封建复古主义的战斗檄文。他指出,“余思之,且重思之,则君主专制之祸耳。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 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⑩这里 李大钊有意识地把自由同专制相互对立起来,抓住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关键环节。所以他说,“代议政治之施行 又非可徒揭槩其名 而涣汗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 俾群己之权界 确有绝明之域限 不容或紊 测性淪知 习为常轨 初无俟法制之力以守其藩也。厥基维何 简而举之 自由

是已。^⑪在李大钊看来，要真正建立民主政治^⑫。因而排斥自由的代议政治是徒有其名的。

基于这种认识 李大钊疾呼要讲求“为我”、“有我”^⑬ 树立自主意识、自我权威 从而冲破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他把实现自由看成是一种权利 失却了自由 必然会失去权利。“失却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他认为 缺乏自主意识“尽丧其为我”的国民“尊重史乘、崇奉圣哲之心既笃 依赖之性遂成于不知不识之间”^⑮。那些“忧乱思治之切者 胥汗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因而使得“神奸悍暴之夫，窥见国民心理之弱，乃以崛起草茅，作威作福，亦遂蒙马虎皮”^⑯。袁世凯之所以得逞，实是国民“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耳”^⑰。

李大钊尤其重视思想自由，他效依英国近代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⑱，在文章中大量引述经严复翻译的密尔的理论，强调“意念自由 既为生民之秉彝”。他还认为，“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消沉 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 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⑲。在吾国 自我之解放 乃在破孔子之束制”。他甚至表示：“吾人对于今兹制定之宪法 其他皆有商榷之余地 独于思想自由之保障 则为绝对的主张。”^⑳李大钊很少使用绝对这样的字眼 这里是一个例外 足见他对自由的执著追求。《宪法与思想自由》是李大钊早期著作中最富激进色彩的文章。在此文中，他把自由视如生命 认为“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 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他疾呼，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能保障充分之自由^㉑。

追求自由、平等 要求个性解放是西方民主政治建设首先提出的命题。从西方民主思想的发展进程来看，也是先提出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思想，然后再涉及代议制度本身。而从中国近代民主思

想发展史来看，自由、平等思想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晚出，思想家首先着眼于政治制度本身的探讨，呈现出与西方迥异的思想发展路径。因此，自由问题没有引起思想家应有的重视。李大钊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主题，将自由奉为代议政治的基础、民主制度的根基。这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尽管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像李大钊这样认识问题，敏锐地抓住西方民主思想真谛的思想家也还是鲜见的。尽管表面上看李大钊似乎没有某些民主制度的捍卫者那样激进，但他的思想却比那些人要深刻得多。

第二 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 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和深入的理性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

李大钊在阐述自己的政治思想时很注意思考、探寻导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原因，并且将这种思考同批判中国封建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联系起来。他说：窃尝端居深念，秘探吾国致乱之源，因果复颐，莫可悉奉而扬其窍要。举凡历史积重之难返，依赖根性之难除，众论武断之难抗，法制拘执之难移，莫不为自由之敌、民彝之蔽、政治之关也。^①他又说：“盖尝远稽列国，近证宗邦，知民彝之絪蔽，自由之屈束，每于历史传说、往哲前贤、积久累厚之群为尤甚焉。为其历史所经阅者弥久，斯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其圣哲所垂诏者弥多，斯其民彝受蒙也弥厚，其民彝受蒙者弥厚，斯其政治趋腐败也弥深。”^②很显然，李大钊把专制主义政治的腐败归因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在传统的束缚之下，国民只知“膜拜释、耶、孔子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风经古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③。尽管中国历史不乏值得夸耀于世的遗迹，但如果将历史传统“正若天经地

义莫或敢违”^②；终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下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③。那就必然使得“豪强者出，乘时崛起，取之以盗术，胁之以淫威，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锢蔽其聪明，夭阏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而吾之群遂以陵替”^{④⑤}。因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历史就是乡愿与大盗窃国的历史，“学以造乡愿，政以畜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命且不堪矣”^⑥。这就是袁世凯得以窃国的根本原因。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和批判有其独到之处。他并没有感情用事，一味地、不加分析地抨击传统。即使对于孔子亦是如此。他认为，“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一伟人而敬之，吾人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惟取孔子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俾孔子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为孔子之我不可也。”^{⑦⑧}我们“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⑨。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李大钊很重视总结中国古代异端思想家和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思想，吸取他们的思想精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非常推崇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仁学》一书成为他阐述民彝思想的重要思想补料。

李大钊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主要集中在对“英雄主义”和“人治”的分析。如果说西方民主政治传统的特点是重法制的話，那么中国专制政治传统的特点就是重人治（英雄政治、贤人政治）。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中心内容。李大钊的反思始终围绕着这个中心。为此，他从历史观的角度入手，深入批判了英雄

史观。他对近代西方思想家的英雄史观作了分析，认为英格兰史学家加莱罗 Carlyle 的英雄论“为专制政治产孕之思想，今已无一顾值；美国文学家耶马逊 Emerson 的理论“终以神秘主义为据，以英雄政治为归”，“亦病未能取”。只有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 (Tolstoy)^②之说“精辟绝伦，足为吾人之棒喝矣”^③。因为托氏主张“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④。李大钊反对英雄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英雄，而是在于“杀迷信人治之根性”，“此性不除，终难以适用立宪政治于美满之境”。他还认识到，“迷信英雄之害，实与迷信历史同科，均为酝酿专制之因，戕贼民性之本，所当力自湔除者也。”^⑤应该说，李大钊的这些认识是有重要思想价值的，“杀迷信人治之根性”既是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的历史问题。

第三，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努力建设“信其民彝，彰其民彝”的新政治，努力建设体现民意与法制相一致的新政治。

李大钊对民国建立以后的政治局面始终是不满意的，这促使他思考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政治。基于此因，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了他的政治设想和方案。在李大钊心目中，最适宜之政治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易辞表之，即“国法与民彝间之连络愈易疏通之政治”^⑥。尽管“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⑦。

从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斗争实践中，李大钊总结出一个很重要的教训，这就是“不能纯恃法律万能之力，以求致治之功”，而要“以民彝辅之，尊重民彝，使其助理之力”。这样，“法之力与理之

力 息息相攻 即息息相守 无时不在相摩相荡相克相复之天 即无时不得相调相剂相蓄相容之分。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进入法之中 理外之法 无不有其缘以失法之力^④。这里 李大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理之力”。从李大钊的论述中 我们看到理之力既是指历史发展进程中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的能动的精神力量（他认为“民彝者 可以创造历史”。这是与理之力有密切联系的），又是指政治上的一种反权威力量。这种力量是真理的力量，它能够摧毁一切阻碍历史进步的反动势力 它是“常新”“常进”的 是人的价值的体现 是人的“彝性之所趋”。李大钊举例说 路德不畏罗马教皇的权威“，昂然崛起 别树新教之帜 以与炙手可热之教皇抗 而率能胜之 则理之力也”^⑤。法兰西革命之时“，卢梭、孟德斯鸠、乌尔斐 伏尔泰 之流 扬其发权自由之声 卒酿革命之风云 而共和之基卒以奠定 则理之力也”^⑥。李大钊对理之力的阐发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是其民彝思想的精华所在 它为李大钊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念注入了革命性的新因素。李大钊一直寄希望于建立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 依靠法制的力量实现代议政治 维护共和制度。然而 严酷的政治现实终于使他认识到 这仅仅是一种天真的幻想。单纯依靠法的力量无法约束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甚至还会以法之力为其张目 剥夺人民固有的权利。因此 要彻底冲决旧势力的反动统治 建立适宜的、理想的政治 必须尊重人民的意志、依靠人民的力量。“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 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

李大钊对于理之力的探讨标志着他的政治思想逐步成熟，他已经对资产阶级代议政治发生怀疑，并且试图改造这种政治。显然，这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的进步。

第四，要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必须重视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

培养民众的参政能力。

李大钊认为“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 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 以‘信其民彝 彰其民彝。吾民于此 其当鼓勇奋力 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③⑦}。为求惟民主义精神与代议制度结合的新政治，先进之国民‘断头流血 万死不辞 培养民权自由之华 经年郁茂以有今日之盛。盖其努力率由生之欲求而发 出于自主之本能 其强烈无能为抗也。吾民对于此种政治要求 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 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 亦较为狭小 而观于革命之风云 蓬勃龙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有艾 则以民权自由之华 实已苞蓄于神州大陆。吾于宜固其秉彝之心田，冒万难以排去其摧凌，而后以渐渍之工夫，熏陶昌大其光采，乃吾民惟一之天职’^{③⑧}。可见，李大钊对于民众的觉醒和政治意识的增强充满希望，这与他对当时政党的失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当然 尽管李大钊相信民众具有政治上的本能^{③⑨} 但是并没有忽视对于民众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民主政治实践后，他对这个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李大钊提出 要促进‘民主政治的精神进展’不使民主政治成为‘高等流氓的藏污纳垢的巢穴 发财作官的捷径 非开发农村不可 非使一般农民有自由判别的知能不可’^{④①}。这样的民主政治‘才算有了根柢 有了泉源’。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属于民主主义思想范畴，它具有丰富的内容，体现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它执著地追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 深入地批判传统文化和传统政治对建设近代民主政治的影响，强烈地要求尊重民众的意志和权利 努力地发挥民众的主观能动意识和作用。在理论意义上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总结。

我们还可以看出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其斗争锋芒直接指向袁世凯的封建复古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从深层次上揭露了袁世凯倒行逆施的危害所在，教育了人民，启发了人民 唤起了人民的政治觉醒。从严酷的政治现实当中 李大钊逐渐发现民主政治建设有其特有的规律 那就是民主精神、自由精神的培养不能滞后 离开民主精神、个性自由、人民的权利 奢求建设新型的民主政治只能是一种空想。因此，他通过阐述民彝思想对广大民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政治启蒙。从这个意义上，民彝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应当占有不容低估的地位。

三

应该说，民彝思想的形成是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李大钊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思想上的飞跃，与他的留日经历不无关系。在留日期间 李大钊广泛地接触西方民主学说、法政理论和经济理论 积极从事反对“二十一条”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同时，他也身临其境感受到日本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从日本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身上获取了思想养料。^⑪

我认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的形成直接受益于日本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熏陶。他的老师、民本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吉野作造博士对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⑫

在日本近代史上，“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是继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它始于 1912 年底 在时间上几乎与中国的辛亥革命相仿。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好经历了这场民主运动，为整个运动提供思想理论指导的吉野作造博士等人又都是李大钊的老师。

吉野作造博士对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做出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民本主义思想”。1916年（大正五年）1月，他在《中央公论》杂志卷首发表了长篇论文《论宪政的本义及其贯彻到底之方法》系统地阐发了这一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吉野作造将民主的 Democracy 的意义区分为“国家的主权从法理上说应当属于人民”的民主主义和“国家的主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在政治上应该为人民”的民本主义。在吉野看来，“所谓民本主义就是对主权在法律理论上属于何人姑置不论只主张当行使主权时主权者必须尊重一般民众的福利与愿望”。据此，吉野作造还提出了“要尊重民意”的思想主张。他认为，“如今民众在政界里是一个积极的势力。在这种时势下，任何高明的政治措施，作为思想来说，都是没有力量的。如果没有人民的力量作后盾，决不能成为政界的实际势力”。在今天通过赋予参政权将尊重民意的意义贯彻到底这种民本主义才是宪政的本义。我们将这种意义的民本主义说成是绝对的原则意思是说以此为绝对的真理世人每多不疑”。吉野作造还批评了英雄崇拜要求“刺激并启发国民的道德”形成“健全的舆论”与民众“进行精神上的疏通”。同时他特别强调，“进行阶级斗争并不是民本主义的本意尊重自由才是民本主义的根本意义”。

吉野作造的这篇论文在日本引起了当代论坛和思想界的异常关注在那里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对当代的民主主义趋势给予了确定的理论形态和指针^④。既然此文影响如此之大当时正在日本的大钊不会对此漠然。事实上，李大钊于是年樱花节脱稿的《民彝与政治》与《论宪政的本义及其贯彻到底之方法》（两文正式发表的时间相距四个月在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民彝与民本也是相通的。

当然尽管李大钊受到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他

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这一思想，而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概念，结合中国的具体政治实际，做出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提出了更具战斗性、系统性的民彝思想。

在李大钊整个思想演变的进程中，政治思想的变化是最显著的，而政治思想的变化又是以民彝思想为基轴的。1917年1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一文，又一次明确使用了“民彝”这一政治概念。他抨击“天坛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斥责它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④4}。自此，李大钊在以后的文章中没有再使用过民彝这个概念。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民彝思想。随着整个世界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中國民主革命的深入，李大钊开始使用新的政治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

1917年2月，李大钊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尊重“平民政治之精神”。他说：“平民政治之精神，所以能显然于吾国，实受世界潮流之赐。”余敢断言，战场之硝烟一散，此昙华幻见之军事内阁，即将告终，而一复其平民政治之精神，此又战后复活之世界潮流也。因此，当政者（指段祺瑞）宜竭力避武断政治之迹而不蹈，事以国民精神意思为惟一之后援”^{④5}。是年4月，李大钊发表了《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一文，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概念。他解释道：“民主主义之特征，乃在国家与人民之意思为充分之疏通”^{④6}。他还认为“法国之民主主义培植于其国民优美之精神”^{④7}，而德国之精神的民主主义遂渐植其根萌。战争之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德国民主主义之势力日趋于盛大，则为不可逃之数耳”^{④7}。李大钊对民主主义特征的诠释和精神的民主主义概念可视为民彝思想的延长。以此为起点，李大钊开始进一步探讨“民主主义的真正意义”并且在文章中使用民治、民主、民主主义和平民主义等政治概念^{④8}。

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升华。然而我们仍旧能够看到“民彝”是其思想的主旋律。他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妇女问题时对现代民主主义精神做了概括，把这种精神理解为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④⑨}。他在探讨建立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工人政治）时仍然强调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中对民国以来的民主政治做了总结后说：“由专制而变成共和，由中央集权而变成联邦自治，都是德谟克拉西的表现。德谟克拉西原是要给个性以自由发展底机会，从前的君主制度，由一人专制压迫民众，决不能发展民众各自的人性，而给以自由。惟有德谟克拉西的制度，才能使个性自由发展”。“德谟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⑤⑩}。可见，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民彝思想的精华。

但是，李大钊的民彝思想毕竟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形成的政治思想，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缺陷。这一思想带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幻想与激情的成分多于现实与理智的成分。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还不能正视阶级斗争，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自由、民主、平等和个性解放，找到实现自由与民主的正确之路。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就在思想上逐步克服了自己早期政治思想的弱点和缺陷，改造了民彝思想。

注释：

② ④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第153、154、157、164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20 页。

⑥⑦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译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4、35 页。

⑧ 《五四时期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55 页。

⑨⑩ 《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96、304、303—304 页。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75、159、315、165、165、165、244、160、160、161—163、246、264、166—167、167、168、158、168、173、174、173、56、157、157—158、650、296、441、444、635 页。

⑬⑭ 继《民彝与政治》一文后 李大钊又发表了《青春》一文 从哲学角度进一步论证“为我”和“自我”这一命题 要“以特立独行之我 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从这个意义上，《青春》也同样是一篇自由宣言，第 167 页。

⑮ 密尔对李大钊颇有精神上的影响。李大钊早在留日之前就已经读过严译穆勒 旧译 名著《群己权界论》（后译《论自由》）他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密尔 说他“于言论自由之理，阐发尤为尽致”。对代议政治的标准论述最为精辟。“论善治标准最精者，莫如弥勒”。

⑯ 托尔斯泰是李大钊极为推崇的学者，李大钊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他，其早期思想深受托翁的影响。

⑰ 他说“良以事物之来 纷沓毕至 民能以秉彝之纯莹智照直证心源 不为偏一曲之成所拘蔽，……”。他在批判英雄主义时明确地提出“，圣智之与凡民 其间知能相去不远”，秉彝之本 无其悬殊”。同上 第 159、167 页。

⑱ 大正时期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等人都曾经是李大钊的老师。

⑲ 吉野作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6—1909 年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李大钊当时正在该校上学，曾听过吉野的课。其后，李大钊到日本早稻大学留学，吉野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是否给李大钊上过课 需要核对有关材料和史实。

⑳ [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第二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 第 167 页。

㉑ 李大钊对民主概念做过研究，但他一般不轻易或随意使用一概念。因为他深感：“Democracy 这个字最不容易翻译。由政治上解释他，可以说为一种制度。而由社会

生活的种种方面去观察，他实在是近世纪的趋势，现世界的潮流，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无一不是 Democracy 底表现。这名词实足以代表时代精神”。参见《李大钊文集》（下）第 501 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 502、503 页。